

第一章 前言

高雄市生日公園坐落於苓雅區三多商圈及新崛江商圈交會處的社區型公園。建設始於高雄市政府的政黨輪替，將高雄都市由傳統工業城市轉為觀光文化導向的都市形象。政策的扭轉使高雄市在近年來不斷設置公共藝術、公園綠地等公共空間形象的營造。因此生日公園便是在一系列土地重劃的開發計畫中誕生，2004 年的四維路的林蔭大道旁，高矮不一、紊亂的違章建築在高雄市政府強勢驅逐之下，過往零星人煙的街景眨眼化為綠意盎然的公園，傍晚公園縈繞著健身體操的音樂，穿著輕便的民眾應和著節奏擺動著身軀與孩童的嬉鬧聲不斷的市民場景令人難以想像幾年前此地的貧窮景象。

生日公園做為見證高雄都市轉變的極佳案例。當市政府大力塗抹都城樣貌，瞬時多座公園綠意點綴在印製的觀光地圖上，但好景不常，高雄市政府經費並未足夠支出維護龐大的公共設施與空間，因此在近三年以來，逐漸將公園一座座委外經由廠商或民間團體經營，其中一座便是生日公園。在公園落成不久後生命之屋轉交咖啡廳管理，在 2010 年又由餐廳改為藝文展演空間，由搗蛋經營團隊開始舉辦多次藝術展覽活動。搗蛋藝術經營團隊利用生日公園之地理優勢及開放的展演空間，試圖將藝術及文化帶入社區，結合居民生活與在地意識，提升民眾的藝術素養，達到活絡社區及藝術教育目的。經由一年多的經營體驗，已初步與在

地居民相互熟識。本計畫的目的意在跨越好奇觀望的階段，透過團隊與居民互相溝通，運用藝術計畫重構社區的公共領域。

本計畫以生日公園附近社區之居民做為對象，從居民的角度敘述個人與在地之生命故事，邀請藝術家與社區居民溝通互動，透過實地調查與訪談，瞭解當地社區居民對生命之特別體驗及回憶，並以錄像與實物之方式加以編輯及建立生日公園社區居民的「生日檔案」，保存居民之生命回憶，同時藉由個人對在地的記憶與經驗試圖重塑一種以下而上的歷史紀錄。生命之屋之展演空間以定期展覽的方式，播放居民所敘述之故事紀錄影片，開放居民使用空間，透過聆聽他人，彼此得以互動溝通。

第二章 高雄城市與生日公園之背景研究

都市景觀改造政策與公共空間私有化

高雄市從一座傳統工業城市，經過一連串都市景觀的翻修、拆除或興建，從捷運建設、新闢公園綠地、街道景觀設計，逐漸蛻變為現代化的海洋之都，自2003年起配合捷運路線設置，建起一系列觀光導向的都市景觀其中以公園及街景的改建為主，但政府接連不斷的新建公共空間，卻未能提供對等的經營維護經費，因此由市政府養工處所轄之公園綠地委外經營者共七處公園，河東路園道、河西路園道、盛興公園、哨船頭公園、生日公園、新光廣場與城市光廊等公共空間，因經費短缺而相繼委外經營。在商家廠商進駐公共空間的同時，的確替政府節省不少經費支出，同時配合都市行銷的策略，讓燈光炫麗的酒吧、咖啡廳成為高雄公共空間的主要景觀，夜晚觥籌交錯與靡靡之音，逐漸侵奪民眾以往休憩活動、閒談交流的公共空間。儘管都市景觀得以美化，成為觀光旅遊手冊上迷人的都市風景，但現實中公共空間中商業的進駐成為私有化，以營利為導向的操作造成公共性退步，如此的真實情況卻隱而不彰。如同居伊·德波 (Guy Debord) 的《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 1967) 一書中，指出影像與再現，在當代社會關係扮演著決定性的角色，為了強化展示性的戲劇效果，時間與歷史因素消蝕，或被虛假的快速節奏所取代，也因為失去語言、觀念等與過去銜接的媒介，在此種只注重觀看與表相的思維下個人的經驗與生活因而完全斷裂。

如前所述，高雄市景觀化並私有化的公共空間，使市民在已繁雜疏離的生活中，更缺乏能參與、互相分享交流的公共空間，桑內特（Richard Sennett）認為市民從主動參與公共事務逐漸轉為傾向個人私密的保護，都市中死亡的公共空間是肇因公共生活的衰亡。因此公共領域被私密的幻想所取代，在實質空間層次上，環境會促使人們將公共領域視為意義闕如。台灣面臨都市住宅缺乏設計和社區人際脈絡的情況之下，生活環境趨於惡化下，政府嘗試透過社區營造來解決這些社會問題。在社區公共空間與設施的規劃設計中，社區活動中心與公共圖書館成為社區共享資源與交流的場域。座落於各個社區的公共圖書館，提供租借書籍、辦理社區相關活動，如說故事、播放電影等、建立社區文史資料等功能。使這些社區公共設施強調便利易於居民擷取資料的場域，在凝聚社區意識，激起居民主動參與公共事務方面仍然相當薄弱。

社區的公共空間新想像

Neighborhoods, in some primitive, inchoate fashion exist wherever human beings congregate, in permanent family dwellings; and many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city tend to be distributed naturally - that is, without any theoretical preoccupation or political direction - into

neighborhoods." (Lewis Mumford ,*The Neighborhood and the Neighborhood Unit*,1954)

如同孟福所說一個健全完整的城市是由不同的社區 (Neighborhood) 所構成，這些社區會依照居民的各種需要，自然而然地形塑出它的面貌，當中的生活設施、空間分佈，或是商業亦非商業性質的活動，都因居民的生活習慣而形成，最重要的是社區中人際關係網絡。真正的社區並不同於由地產商所主導開發，並將一切生活模式都預設已被既定空間模組化、安排設計好的住宅區域，而是由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彼此互動建立起來的自發性社區。都市開發快速的過程，所顯示對於現代性的憧憬，但卻滯留於乾淨、進步、秩序等表面的想像，對於其內在意識形態與公共意識缺乏深入的理解。許多公共空間的規劃與設置因而停留在實體空間的討論，只強調管理與制式化的參與，並未完整表達所謂公共領域的概念。反觀生日公園興建，從高雄市政黨輪替所產生對都市計畫理念政策的轉向，到違建住戶的拆遷使深受中產階級所喜愛的公園綠地落成。這樣的公共空間生產的背景之下，其中經歷差別待遇的弱勢族群與不同處境的個體是如何回憶這段歷史？而事件對於公園活動的居民產生何種想法與感受？當生日公園作為一個提供大眾活動、休閒育樂的公共空間，帶出何種社會關係？經由拜訪仁政里里長詢問居民互動的情形，瞭解到在生日公園的午後，許多外籍看護會推扶老年人散步或活動，而傍晚則多半是親子休息遊玩的時間等活動情形。我們如何能提供

一個平台或機會，使著些獨立活動的人們能更進一步認識彼此，就從述說自己的生命故事開始。

在城市中孤立的情境下，藝術能扮演何種角色？藝術激起感知的特性，使其能成為溝通交流的媒介，容易在空間中形成一種非強制性的互動與分享彼此的關係，透過藝術家自由與創意，在公共空間中促使每個人與彼此間、與社會間互相交流，藉由作品與場域間的連結，使各界引發各種不管是感性的羈絆或是理性的批判、討論等等事件和精神的發生（Grout，2002）。

卡特琳·古特（Catherine Grout）認為藝術是作為公共空間發揮其公民廣場功能的媒介，而藝術家則是對時間與空間兩者的觀察與思考後，並且創造出這些藝術的重要角色，明確地敘述了藝術介入空間與公共空間之間的重要關連性 - 藝術介入空間是公共空間，發揮公民廣場功能的一種有效且有利的方法。因此藉由本計畫的實施運用藝術的操作手法，建立起居民認識、互動的平台，並更進一步能連結出新的社群關係，是立基於分享與共同維護的公共理念。但在近年藝術介入空間的實踐與理論仍缺乏對於公共性的討論，公共是否意味著多數社會群體或是由政府公權力所賦予的公共利益？將於下章作公共性理論的脈絡爬梳。

第三章 公共性之理論探討

公共領域理論探討

列斐伏爾 (Henri Lefebvre · 1991) 所發展出來分析社會空間的三元論中，探析社會空間在不同社會歷史背景之下，來自相異背景與社會經濟地位的設計者與使用者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空間中投射自己對於空間的想像，因此他將空間分為三類，空間實踐 (spatial practice)、空間的表徵 (representation of space) 與表徵的空間 (representational space)，其中空間的實踐 (spatial practice)，是人們真實生活中對空間的解讀與實踐。空間的表徵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意味著空間的概念化與抽象化，是人們藉以引導實踐的概念模型。而表徵的空間 (representational space)，則是一種象徵與感官的生活 (lived) 空間，生活在其中的主體有被主宰的經驗，但卻具有轉變並挪用空間既定使用概念的企圖，在此處列斐伏爾特別強調人的實踐是改變空間的重要因素。因此列斐伏爾強調空間是政治的、是社會鬥爭下的產物。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開啟新的檢驗空間的方法，同時揭開空間是存在於社會關係的支持與生產下的產物。因此在探討社會空間時，不可忽略的是存在於空間中的社會關係，而社會關係的檢視則必須藉由理解特定社會中歷史發展與社會脈絡的轉變。藉此在定義公共空間時，必須探究其如何被生產，以及在所謂公共空間中的社會關係是如何連結與建構的。

公共空間意謂公共性的空間，在公有與私人的討論上，公共隱含著集體與權力的意思並與私人的概念相對立，是大眾皆享有使用與參與權力的實質空間。在不同的社會與文化脈絡下對於公共有不同的理解，同樣地公共空間的運用與設置也不盡相同。但隨著西方現代性與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台灣都市的景色與設計逐漸偏向西方思潮，從都市公寓形式的居住空間到公共享有的公園綠地，而從公共空間的配置與使用可以觀察到社會的日常結構和意義。當代西方對於公共領域的討論，可回溯至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與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的論述。兩者對於西方歷史發展與政治經濟環境下所起的公共領域的概念有精闢的分析。漢娜鄂蘭對於公共領域的理想以希臘城邦政治哲學的思想為基礎，強調的公眾的自由辯論與參與的權力。自古典希臘的城邦社會，公共空間存在於人潮聚集流動的空間中，如廣場等，人們可在這些空間中對他人自由發表其想法，並聽取他人的看法，彼此因分享交流自己的思想而使這互相對立的存在奠基在自由平等之上。在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 1958) 的公共空間的討論中也強調這種個體的實踐權力應是平等與自由的，自由是使個體可以透過展演、表現、言說展現自我，正因這種多元歧異的敘述才能達成公共領域的溝通。但細察漢娜鄂蘭所推崇的公共性中，仍存在著排拒他者性質，在希臘政治活動中個人所擁有的參與權力仍拒奴隸、婦女與小孩等社會弱勢族群在外。

對於公共領域的探討哈伯瑪斯 (Jürgen Habermas , 1962) 則從歷史的角度，來闡明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理想類型。在十八世紀歐洲，英國、法國與德國

等強大帝國，咖啡館、沙龍與印刷媒體都成為人們得以自由辯論與交換各種訊息及意見的空間或平台。而十八世紀在國家機關與市民社會之間所產生的公共空間，經由辯論形成的公共意見或輿論，能平衡與理性化國家權力的操作。保證一般個體參與國家與社會狀態的規劃，使這種公共性的活動與空間影響了日後政治的形成。但進入十九世紀後，哈伯瑪斯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帶來了破壞，公共領域被資產階級的社會所取代，公民社會已被特殊階級的利益所挾持，加上大眾媒體的影響以及政治制度的分化，都讓政治脫離日常生活，使公共領域逐漸消失，人們變成聽眾不再是參與者。

從漢娜鄂蘭與哈伯瑪斯兩者探究公共性的理論來看，公共空間是眾多權力交合的場域，從國家機關、社會階層與媒體輿論等。二十世紀晚期，資本主義與土地私有化對公共領域的入侵在都市研究中已有相當多的文獻探討，分析公共領域的權力、公共性在資本主義掌控下的消失。

在《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之中，珍·雅各 (Jane Jacobs) 直接指出，公共治安主要並不是靠警察來維持的，而仰賴於人們互動特質，一語道破都市公共空間的消失與都市空間的區隔，使都市中弱勢族群如流浪漢、窮人等在都市公共空間的設計規劃中被輾除在外，而都市社區彼此守望相助的鄰里意識弱化，使政府公權力必須加上圍牆、監視器與警衛等防衛機制來確保都市的安全與秩序。種種都市規劃、公共設施的配置與現象都顯示都市中社區意識的薄弱。

綜合以上各家之言，對於公共領域可解釋為，存在於實質空間的場域中動態的空間，存在於其中的個體具有自由發表、展演多元的自我實踐的權力，而這樣張顯公開的過程，必須在有他人在場，目睹、聽聞或回應的情況下才是所謂具有公共性的空間。在公共領域的討論中，並非是以達成共識為目的，而在於自由展現的功能，而在此過程如何聆聽、交流與互動才是公共領域存在的目的。而在現代化都市的規劃下，社區的力量如何重塑成為社會各方所面臨的問題，從前鄉村鄰里的守望概念在城市住宅空間中逐漸消蝕，因此社區如何重塑一個具有公共性的空間便成為解決方案之一，透過實踐多元、自由交流的公共領域，才能重新堆砌社區的力量。